書　　評

評介 *Remembering the Samsui Women: Migration and Social Memory in Singapore and China*

楊　惟　安 *

書　　名：*Remembering the Samsui Women: Migration and Social Memory in Singapore and China*
編　　者：Kelvin E. Y. Low
出版時地：UBC Press, 2015
頁　　數：268 頁

過往中國海外移民的研究，以華僑男性為主，較少關注女性移民的議題，因此甚少對三水婆進行論述。只有在少數

*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

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　第 27 期（2016 年 6 月）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與中國女性移民的專書論文中，涉及華人婦女工作類型時，會提及三水婆對新加坡公共建設的貢獻。范若蘭的《移民、性別與華人社會：馬來亞華人婦女研究》，描述三水婆在新加坡工地的勞動情景。新加坡國立大學 Tung Chee Hong 的研究論文 *The Cantonese Women Building Laborers: AStudy of a Group of Sun-Sui Women in the Building Trade* (1960)，透過個案訪談的方式，來檢視探討三水婆的生活經歷。臺灣清華大學吳佩瑾的研究論文《建設或建構？以新加坡「紅頭巾」為例探討女性與國家的關係》，則是從人類學的角度，來闡述三水婆與國家概念的關聯，及其生命經歷與社會記憶的變遷。

作者 Kelvin E. Y. Low 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，研究主題涵蓋東南亞與南亞的社會記憶、公民身分與移民等相關議題。本書除了導論與結論之外，共分成六章。作者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論述三水婆的移民歷程、建構社會記憶與塑造國家認同的關聯性，並透過社會記憶與華人移民史的文本，從各個面向來重建三水婆的生命故事，進而闡述她們對自身經歷的回憶，及周遭人們對此移民群體的看法。首先，作者論述中國婦女出洋的背景、過程，及分析為何新加坡選擇三水婆作為形塑開國先驅的代表。其次，作者闡述新加坡政府如何透過大眾媒體、藝術作品、展覽活動來重構三水婆的形象，並強調其勤儉與刻苦耐勞的優點，足以作為新加坡人民的模範楷模。最後，作者採用大量的文本與口述訪談的資料，來檢視三水婆的人生故事，以了解她們在中國的生活情況、選擇出洋的原因，及為何選擇在新加坡的建築工地工作。

中國女性移民出洋的歷史

作者從探究紅頭巾們到新加坡的動機與時代背景著手，指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華人女性移民模式不太相同。十九世紀中期，女性移民透過與家人同行及人口貿易的途徑來到新加坡。前者是因爲清朝實施海禁政策，禁止女性出洋，許多華人婦女跟隨丈夫或親戚到新加坡工作；後者女性則以娼妓或是妹仔爲主，多數是遭人掠賣或拐騙，而被賣身出洋的少女與幼童。此因苦力、華商、及英國士兵的到來，帶動了新加坡娼妓業的發展。第一次鴉片戰爭後，廣東、福建等沿海地區向海外秘密販售婦女。這些女性主要在新加坡從事婢女、娼妓或女傭等工作。隨著苦力貿易的公開化與合法化，《北京條約》中的招工條款提及只要願意出洋的子民，都可以攜帶家眷同行，即清政府允許其人民自由進出廣東與香港，不再以法令約束他們的活動。中國、香港與新加坡之間建立起的苦力貿易網絡，亦創造出一個利潤豐厚的市場。[1]苦力、華商及英國士兵的到來，皆帶動了新加坡娼妓業的發展。娼妓業的興盛，反映出新加坡華人社會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問題。要到二十世紀初期，更多的中國女性來到新加坡工作，才使其由移民社會轉型成定居社會。

二十世紀初期，大批中國女性來到新加坡，是因爲 1920 年代的經濟危機。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，造成大量的失業工人，促使殖民政府出資將中國工人送回中國，以舒緩國家的

1 James Francis Warren, *Ah Ku and Karayuki-san: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-1940* (Singapore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p. 77.

經濟負擔。同時，經濟大蕭條也對中國沿海地區的茶葉、紡織業、榨油業等行業造成影響，特別是中國絲業的生產中心廣東，多間繅絲廠破產倒閉，許多女工因此失業，而選擇出洋謀生。[2] 1930 年，殖民政府頒布《外僑法令》，根據經濟情況與勞動的需求，來調整移民人數配額。但婦女與小孩的移民人數不受到限制，因此有許多中國女性來到新加坡，尋找工作機會。在這時期，多數婦女是出於謀生或自立的需求而移居海外，從事的職業以女僕、建築工人、工廠工人、商販爲主，不同於十九世紀女性移民多爲非自願出洋者。[3]

作者指出，媽姐與三水婆最常被人視爲同一類型的女性移民群體，此因二者都是因爲家境貧困而選擇出洋，且對家庭與婚姻秉持著強烈的自主觀念。然而，媽姐多爲立誓守貞的單身女子，主要在歐洲人、華人與馬來人家庭從事女傭的工作，其行蹤遍及馬來半島與新加坡。三水婆的「婆」則強調著其已婚身分，主要來自廣東省的三水地區，多在新加坡的建築工地工作，爲該地的特殊群體。新加坡政府在形塑其國家記憶時，看重三水婆對城市建設的貢獻，而其勤儉與刻苦耐勞的特質，更獲得了人們的尊重，這是三水婆被選爲開國先驅模範的主因。作者進一步地論說，這是因爲獨立後的新加坡需要透過重構人民集體記憶的方式，來打造其對國家

2 范若蘭，《移民、性別與華人社會：馬來西亞華人婦女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華僑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63。

3 參考范若蘭，《移民、性別與華人社會：馬來西亞華人婦女研究》，頁 82。作者認為近代婦女移民類型可以分成三類：依附遷移型、主動遷移型，與被動遷移型。第一種類型為女性隨著丈夫或親戚移居至海外生活。第二種類型為婦女出於謀生或自立而自願選擇出洋生活。第三種類型則是婦女遭受人口販子欺騙拐賣至海外，並非出於自願移居海外。

認同的共同意識，以凝聚多元族群的力量。

記憶製造與三水婆形象的塑造

1959 年，英國給予新加坡自治權，後者在 1963 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來取得自治權。1965 年，新加坡獨立，為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。此因殖民政府統治時期，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，將新加坡各個族群區隔起來。因此，新成立的新加坡政府需要由上而下的推動各項措施，來重新建構人民的國家意識。在此背景下，新加坡作為移民型社會的本質，需要藉由國家重構的程序，來規劃治理多元族群社會的政策，並設法讓一個移民型社會轉型成為一個全球化、統一的現代化國家。

作者指出，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曾對遺產文化的保存展開討論，得到的結論為一個國家不能光靠現代化與都市化而存在，除了向前看，還必須保存過去的文化遺產，也就是不能為了國家的進步與改變，而放棄保留國家的歷史文化遺產。因此，新加坡在 1970 年頒布了《保存古蹟法令》，並於隔年成立保存古蹟委員會，目的就是透過保存歷史遺產的計畫，來激發人們對國家歷史的重視。至 1980 年代，歷史遺產保護更成為都市計畫的重要項目。在此政策的執行上，新加坡政府藉由重構過去移民社會樣貌，讓人民體會到前人建設國家的艱辛，進而將各個族群凝聚起來。

在此計畫下，三水婆被新加坡選擇作為建構國家社會記憶的最佳代表。此因她們兼具華人移民、開國先驅、勞動者、女性主義者，及老年者等多重形象，其生命經歷亦見證了新

加坡如何從移民型社會轉型為定居社會，及從英國殖民地蛻變為獨立的國家，訴說著她們如何克服艱困的生活環境，從移民者的身分轉為新加坡公民，逐漸在新加坡落地生根。作者指出新加坡政府藉由歷史手冊、演講稿、藝術作品、雜誌、歷史劇等資料，以呈現早期移民女性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不屈不撓的精神。新加坡政府在建構國家集體意識過程中，為了避免人們忘記過去的歷史發展，亦將三水婆形塑成倖存者的形象，是值得社會大眾尊敬的開國先驅。

近年來，與三水婆有關的社會記憶重建，幾乎都將焦點放在她們的紅頭巾上。三水婆穿著藍或黑色的衣衫，頭戴紅頭巾，為人們對她們最深刻的印象。紅頭巾主要用來遮風擋雨、避免太陽直曬，及保護她們免於受到工地灰塵之害。作者闡述新加坡政府，則是以紅頭巾做為製造社會記憶的物品，無論是紀錄片《家鄉》(Homeland)或童書《三水小女孩》(*Samsui Women*)，都在強調紅頭巾堅忍不拔的形象，進而將她們與喚醒國家集體意識，和建構國家認同的活動連結起來。在此架構下，作者綜述新加坡政府如何透過建構國家記憶、記憶製造，及個人資料等方式，來形塑三水婆的形象。其中以記憶製造最能突顯三水婆與重構國家歷史意識的關聯。舉例來說，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販售三水婆娃娃，及定期舉辦三水婆藝術作品的展覽等透過藝術創作、文學作品、展覽活動與大眾媒介等方式，都有助於讓新加坡人民體會到先民刻苦耐勞的精神，並了解新加坡從移民型社會轉變成獨立國家過程的艱辛。

從中國到新加坡：三水婆的工作與家庭生活

承續前一節的討論，作者採用三水婆的口述訪談資料，來了解她們的移民故事、工作經歷，及對家鄉的回憶。在這些文本中，三水婆的移民經歷爲其生命故事最珍貴的一頁。從她們的移民軌跡，可以了解新加坡如何從移民社會轉變爲獨立國家的歷程。三水婆選擇下南洋的原因，不外是家境貧困、與婆家不和，或是出於天災而被迫扛起擔負家計的責任。在中國南部省份，三水婆主要從事農耕工作，如種植作物、耕田，與收成稻米等粗重工作。作者認爲正是因爲她們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中從事勞動工作，所以不排斥在新加坡的建築工地工作。三水婆選擇出洋的原因，則多出自於經濟與家庭因素，如媒妁之言的婚約、不愉快的婚姻、天災等因素，迫使她們走上離鄉背井之路。從三水婆的口述訪談中，能得知她們是透過家鄉的水客、親戚或是會館的引介，提供想出洋的女性移民與入境港埠的資訊，包括新加坡的居住地點、應徵工作等資訊。到達新加坡後，多數三水婆前往位於豆腐街及其他區域苦力聚集之地，透過親戚或仲介商的引薦，到建築工地工作。

上述的移民與工作經歷在三水婆的回憶中是最常提到的，但她們只能記起片段的畫面，迴避講出完整的過程。作者就此情況做分析與論述，認爲除了時間久遠外，也是因爲多數三水婆的下南洋動機爲逃婚、逃離婆家，或是爲了擔負起家中經濟重擔等因素。因此在訪談過程中，三水婆常會選擇性地遺忘某些事件的發生過程，以規避其生命故事中較隱

晦的片段。此外，新加坡政府採取社會記憶製造措施，透過展覽活動與大眾媒體重新建構她們的形象。每年新加坡政府會對三水婆進行表揚，並重述她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。透過這些紀念活動，期許新加坡人民莫忘前人的辛勞，也將三水婆的生命經歷與國家歷史連結起來。作者認爲三水婆無法想起出洋的詳細過程，是與政府重新建構其形象，及周遭人們對其既定印象的論述有關。

借助這些口述訪談，作者進一步地闡述爲何新加坡政府選擇三水婆做爲開國先驅的原因。三水婆從移民者、建築工地勞動者到新加坡公民身分的轉換，與新加坡的歷史發展相呼應，爲新加坡移民史、華人社會史的見證者。因此，作者認爲新加坡政府對三水婆的生命故事，是有條件地進行篩選，以選出最適合作爲開國先驅楷模的三水婆女性。在推崇三水婆刻苦耐勞的美德時，新加坡政府亦強調這些特質，是她們在中國的家鄉培養出來的，藉以讚揚三水婆自我犧牲與盡孝道的精神。作者指出這是爲了與新加坡政府在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所強調的儒家價值觀來做呼應，可以讓三水婆的特質更受到人們推崇，並效法其精神，進而加強新加坡人民對國家的認同。

1980 年代，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後，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，也開放了外僑入境的限制。許多三水婆因此走上了歸鄉的旅程。作者亦在口述訪談中，詢問三水婆回鄉之後的感受。多數的三水婆覺得因爲長久離鄉，而與家人的相處非常生疏，亦無法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，因此只有少數的三水婆選擇回家鄉定居。另一方面，作者也訪問了三水婆的親戚、朋友及新加坡人民對她們的印象。基本上，這些受訪者都肯

定三水婆的貢獻，認爲她們在新加坡的現代建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透過三水婆的生命故事與周遭人們對她們的印象，可以了解三水婆的身分已經從移民者轉變爲新加坡公民，她們已經視新加坡爲「家」，在中國的家鄉對她們只是一個遙遠模糊的回憶。

在本書中，作者論述三水婆來到新加坡的人生經歷，對下述議題進行了詳細的剖析：爲何新加坡政府選擇三水婆做爲社會記憶再造的對象？新加坡運用了哪些大眾媒體來重新形塑三水婆的形象？三水婆對其生命經歷的回顧爲何？透過對這些議題的分析與論述，作者說明了爲何只有三水婆這一移民群體，符合新加坡政府重構國家認同的條件。然而，本書使用的史料中，並未引述報刊資料，實爲可惜之處。1930 年代，爲新加坡華文報業蓬勃時代的時期，《星洲日報》、《南洋商報》及《新國民日報》等大報，皆設置婦女副刊，專門討論婦女教育、婦女問題，及介紹婦女日常生活等議題。若作者能引述當時人對三水婆的觀感，將能與現今新加坡政府形塑的開國先驅形象做比較。假如當時有關三水婆的新聞報導非常少，亦能突顯出建國後的新加坡政府對三水婆在不同時期的觀感，且能從另一個視角了解爲何選擇她們做爲勞動模範。

結　語

整體而言，本書透過新加坡政府形塑三水婆的形象，將其與重構國家認同的政策做連結，有助於人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新加坡華人史的發展。三水婆在 1960 年代以前爲一群

默默無聞的勞動者，但新加坡政府藉由各種類型的文本資料與大眾媒體，來重新打造三水婆的形象，強調她們在國家建設的貢獻，喚起了人們對這群被遺忘的勞動女性的記憶，卻也造成記憶的扭曲。作者因此採用三水婆的口述訪談資料，及其親戚朋友對她們的觀感，以了解三水婆如何在艱困的環境中求生存，她們爲新加坡現代化建設做出的貢獻，及其刻苦耐勞、勤儉、自立自強的特質，解釋了她們所以成爲新加坡開國先驅的模範代表的因由。該書的確爲二十世紀華人婦女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，絕對是值得一讀的好書。